

YTS 3/23

西岗文史资料

第二辑

政协大连市西岗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目录

大连自然博物馆馆址简介	韩全忠	55
大连天主教	大连天主教爱国会	59
大连基督教	王德良	65
我的足球运动生涯(续篇)	马绍华	74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大连露天		
市场”	大连工商联文史办公室	90
“周家炉”兴衰浮沉记略	田 仁	104
从“纪风台戏院”到群众剧场		114
资料拾缀		116
后记		118

国民党妄图接收旅大 的阴谋破产

1945年“8·15”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开创的根据地，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已成为推进全国革命胜利的战略基地之一。作为东北门户的大连，因其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经济基础和地理条件，在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之苏军的帮助，大连人民不仅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的地下颠覆、破坏活动，而且也有效地粉碎了国民党妄图公开接收旅大的阴谋活动。进而把旅大地区建设成为东北巩固的后方基地，全力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争取东北的任务。毛泽东同志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們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立即部署了进军东北的任务。1945年9月15日，党中央

作出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决定，坚决争取东北。为此，派出大批干部和主力部队向东北挺进。同时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统一领导东北地区的工作。9月19日夜，党中央向全党发出指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旅大地区位于东北的最南端，具有大商港和天然的军事港口，又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工业城市。当时大连是山东解放区进入东北的交通要道和最好的落脚点。1945年10月中旬，韩光受东北局之命，到大连担任市委书记，建立党的组织和民主政府，并且建立了一支规模较大的公安武装力量，恢复与发展了生产，有效地控制着这座城市。

国民党反动派，此时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关于行政管理权交给国民政府的承诺，取得了接收东北主权的有利地位，并制定了“控制华北，抢占东北”的战略方针。但因远在西南和西北的国民党军队，一时无法调入东北地区，国民政府便急忙先行宣布行政首脑的任命，同时加紧勾结美帝国主义，实行武力争夺东北。先后攻占沈阳、长春等地，占据了东北大部分城市，并且不断玩弄阴谋，为“接收”旅大制造舆论。国民党认为：“如果苏联同意国军开入，则可以断绝中共在山东与东北间的一条联络路线。所以大连一地，在战略上比哈尔滨更为重要。”因此对旅大地区在接收与反接收的问题上，共产党与国民党始终存在着激烈而尖锐的斗争。

1945年8月22日，按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关于大连、旅顺口之协定的规定，苏联红军进驻旅大。9月初，国

民党就开始插手，妄图控制旅大。

1945年9月，国民政府任命沈怡为大连市市长。沈怡即在重庆及上海两地设立了大连市政府办事处，筹划“接收”大连的准备工作。

1945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外交部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莫德惠等四十余人，分乘两架飞机抵达长春，与先前到达同苏军谈判的国民政府军事代表团团长、行营参谋长董彦平会合。次日，熊式辉等人，在长春苏军司令部与苏军举行首次会谈。国民政府方面有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董彦平，苏方以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为首。熊式辉提出，他来“办理东北政治经济的收复事宜，希望得到苏联盟军的善意帮助”，并提出四项磋商要点，除要求苏方协助国民政府建立政权，接收日本及伪满的工业机构及设备，空运少量部队至沈阳、长春外，其第三项要点是为“我方决定海上船运军队到东北接防，请指示适宜登陆地点，并予以协助。又，我方拟船运军队在大连港登陆，请将该港口现状见告。”马林诺夫斯基对此答称：“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大连为自由港，中国军队不能由大连港登陆。”拒绝了国民党方面的要求。

10月17日，熊式辉在第二次会谈中，又一次提出：“中国军队两个军由海上船运至东北，可于本年11月初旬在大连港登陆；另两个军经山海关陆路开来东北。”并且提出：

“中国方面拟先派员视察东北各主要城市，如大连、哈尔滨等地之现状，俾作接收前必要之准备。”马林诺夫斯基表示：“中国军队进驻某一地区时，须待苏军自该地区全部撤

退之后。在此种情形下，苏军不可能掩护中国军队前进。”对于行政接收问题，则答称“须请示莫斯科。”

国民党的企图未能如愿。10月20日，董彦平在与苏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巴佛洛夫斯基中将交涉时，再次提出国民政府军队在大连登陆和设立航空站的问题，并拟派大连市接收委员王洽民赴当地视察。

在这期间，驻旅大苏军对山东渡海北上的八路军也采取了解除武装的做法。共产党进军东北的部队，主要是从已经解放的烟台、龙口，栾家口等地乘帆船过海，目标是已在八路军控制下的庄河、安东（今丹东）一带登陆。由于风大，常把航向吹偏，使船进入大连沿海区岸。苏军见到穿着军装的部队，都要扣留审查，在确信是共产党、八路军时，虽予放行，但毕竟耽误进军时间。为此，1945年10月初，中共中央东北局派韩光到大连，同苏军交涉，从山东乘船来东北的部队，万一被风吹进大连地区，要求大连的苏军当局给予方便。苏军驻大连警备司令高兹洛夫中将，当即答应了要求，同时介绍了苏军进驻大连一个半月来的简单情况，特别告知韩光，“国民党市党部的牌子都挂出来了，你们再不来，将来国民党就要把你们的脖子掐住了。”韩光回到沈阳向东北局汇报后受命担任大连市委书记，立即返回大连“抢形势，搭班子”，迅速建立起大连市党、政、警的领导机构，开始控制了大连的局势。

国民党政府代表与苏军驻东北最高当局的谈判，几番周折，连连碰壁。10月21日，熊式辉飞往重庆，请示国民党政府解决在大连登陆问题（26日熊又飞返长春）。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外交部与苏联驻中国大使也就大连问题多次接触。

12月21日，苏军巴佛洛夫斯基中将拒绝了董彦平的要求，指出：“中国军队在大连登陆，我方不能同意。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大连是商港，如允许军队登陆，就是违反条约。前次阁下提意在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设立航空站，大连是商港，我方不能同意。”

苏联坚持“大连问题不是任何方式的外交途径所能改变”的主张。国民政府企图依靠美国海军的帮助，从大连登陆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这就迫使国民政府军队在美国的帮助下，从秦皇岛强行登陆。经过激烈的战斗后，才缓慢地沿着山海关、锦州等陆路进入东北。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国民政府军队进入东北的进度，为共产党进军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赢得了时间。同时，也使大连免受国民政府的践踏，保证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府有效地开展工作，安定了民心。

由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制约，苏联对国民政府一再要接收大连地方行政权的要求不便拒绝。1946年1月6日，苏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特罗增科中将在给董彦平复信中称：“已接获大连方面的复电，中国政府在大连建立政权，苏联方面可无阻碍。”第二天在双方会谈中，董彦平提出：

“大连接受经准贵方复函可无阻碍。我方接收人员即将前往大连，请贵方派定联络官，并完成其他必要之手续，俾早出发。”1月18日，蒋经国与沈怡飞抵长春，准备进入大连。

1月29日，董彦平在第九次会谈中，又提出要求苏军保证接收大连人员的旅途安全问题：“大连市接收人员拟俟2月2日以后再去，因此时适逢中国旧历新年，官民均在休假期间，不便推动工作。又据报大连市现有武装工人纠察队8千

人，是否可无顾虑？闻沈阳至大连各小车站，沿途均有八路军登车检查，此种现象实非正常，请设法纠正。”并向苏军提出要求：“派相当兵力护送前往，如遇非法检查，即可由苏军出面制止。”特罗增科一再表示，“无权将部队开过沈阳、鞍山以南。苏军只为协助中国建立政权，而非参加中国之内战。”双方就“安全”问题会谈多次，未能达成协议，国民政府则不得不派人员前往大连。到1946年3月7日，董在与特罗增科的第13次会谈中，还借运输联合国救济总署物资为由，提出使用大连港的要求。特罗增科则以大连港非属管辖范围为由，拒作答复。然而，国民政府急待全面接收大连的企图一直未曾放弃。直到1947年1月3日，美国照会苏联，提出“大连应即由中国管理，开放国际贸易，恢复中国长春铁路交通。”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的宣传工具也大造舆论，声称在沈阳已设立了“大连市政府”，准备了警察3千人，任命了大连、旅顺两市市长等。

1947年3月7日，苏联政府再次向国民政府提议：“在整个旅大地地区应迅速建立适应于1945年8月14日签定的中苏协定要求的中国行政。”于是，国民政府以为大连即时可以到手，一时紧张万分，各接收单位都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筹划着怎样“勿失良机。”经苏联当局同意，国民政府派出以董彦平为首的旅大视察团进行实地考察。

中共旅大地委，一直严密注视着国民党企图接收大连的各种阴谋活动，采取了一系列的相应措施。

1947年4月，旅、大、金行政联合办事处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地方民主政府——关东公署，成立大连市政府。公署统辖大连市、旅顺市、大连县和金县，缩小大连

市内范围，以便万一交出大连市行政权时，尽量减少损失。苏联政府对此特派梅列兹果夫元帅飞抵旅顺，对民主政府人选的组成，提出“三三”制的配备方案，即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各个阶层（包括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按照旅大地委的安排顺利进行。为避免政府名称与其他解放区民主政府相似，经过协商，便把旅大政府的名称命名为关东公署。至此结束了旅大金行政联合办事处的临时机构，关东公署成为旅大地区的正式权力机关。

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关东公安总局和社会部，从组织上，思想上及工作上相应地采取了必要的措施。牢牢掌握警察队伍，巩固支柱力量。1947年4月3日，旅大公安总局改称为关东公安总局。于1947年5月4日，成立了大连市公安局，管辖寺儿沟、中山、岭前、西岗、沙河口、消防、水上七个公安（分）局。并且加强了铁路公安局的领导力量，以便应付一旦出现“开港通车”的局面时，亦好与国民党继续进行斗争。

国民政府军队从占领瓦房店、普兰店、庄河等地之后，对旅大地区从陆地到海上，施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为了克服困难，1947年2月，中共旅大地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决定》，要求这一运动“应紧紧掌握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能大即大，能小即小的原则。”全区城乡人民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做军鞋，织渔网，开荒种地。同时，民主政府又颁布了奖励粮食进口的《暂行办法》，多方组织人力、财力、运力，从华东、华北其他解放区想方设法购运粮食，帮助群众战胜粮荒。积极组织恢复工业生产，保证工人生活。

地委还于1946年7月7日，作出《关于开始大连住宅调整运动的决定》，适时领导了全市三次住宅调整，群众高兴地称之为“搬家运动”。到1947年5月，视察团来旅大前夕，全市住宅调整已基本结束，有15895户居民住上了好房。

国民党接收大连的企图尽管不断受挫，但大连地方政权移交给国民政府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地委坚定不移地认为，无论如何，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全力支援前线，但要服从苏联外交的需要。“党应研究巧妙布置、隐蔽的、合法的取得人力、资金、物资、药品等，以便支前。”国民党视察团到大连之前，地委经与苏军当局交涉，将炼钢厂、化学厂、汽锅厂等工厂移交给关东公署。这些工厂连同建立的炮弹厂、引信厂、以官、商合股的名义，以经营化工原料、钢铁、机床为掩护，组成建新工业公司，实际上组成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大型兵工联合企业。

5月中旬，中共旅大地委发出《关于在关东地区实行苏军用票和满票登记盖印的通知》（满票指伪满洲国货币），要求全党在5月23日至28日，限期完成货币登记盖印工作。它不仅有效地制止了其他地区苏军货币的流入，保护了旅大地区的金融经济，而且使视察团的阴谋彻底破产。他们所携带的5千万没加贴印花的苏军货币变成了一堆废纸。

1947年5月28日下午，地委书记韩光和公安总局局长周光，接苏军大连市警备司令部电话后，会见克章诺夫少将司令官，通告“6月1日前后，国民政府视察团来大连，应立即准备‘迎接’工作。”

5月29日晨，地委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内紧外松，不

冷不热”的斗争方针，并对视察团来连的企图和活动作了分析研究。地委组成“临委会”，负责领导这场斗争。

国民政府旅大视察团乘1200吨炮舰——长治号，由葫芦岛出发，于1947年6月3日12时，抵达旅顺港口，15时开始登岸。视察团由国民政府东北行辕副参谋长董彦平（中将）任团长，成员有国民政府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张剑非，中长铁路局副局长王竹亭，大连港口副主任徐祖善，国防部代表叶南、陈思永，视察团秘书长邱南，行辕政治顾问朱新民，国民党大连市政府社会局长兼东北敌伪财产接收委员会大连分会副主任王治民（旅顺人），副官王源燮、郭中祺及吴文甫，共计十二人，携有5千万元苏军货币、电台、无线电话、照相机、望远镜、打字机等。苏军指挥部代表秦琴科少将，关东公署主席迟子祥，旅顺市市长王世明，关东公安总局局长周光等人到港口迎接视察团。

视察团到旅顺后，在俄罗斯旅馆（今黄金山海军疗养院）稍事休息，董彦平与政治顾问朱新民召集时仅5分钟的视察团会议，接着即回拜苏军当局，唯王治民未去。

视察团划分三个组，详细安排视察日程，以实现其预定计划。但在苏军当局和人民公安机关有组织、有计划、有理有节的限制、拖延下，其计划大部分都已落空，仅参观了旅顺博物馆、大连港、铁道工厂（今机车车辆厂）、船渠（今造船厂）、金县，访问了市政府、美、苏领事馆等处。

视察团在旅大的十天活动，在各种场合的言谈话语当中，从不承认地方民主政府，并且到处刺探情报，煽动群众。地委对董彦平拒不承认地方政府的姿态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结果视察团到处碰壁一再遭冷遇。迫于无奈，视察

团派出王治民等出面，先后拜访了大连市政府、关东公署。会见中，两级地方民主政府负责人据理驳斥了国民党对旅大地方政府和人民的污蔑，介绍了旅大建政以来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在旅大期间，见社会平静，秩序正常，生活安定。面对现实，视察团尽管别有用心，却又不得不承认地方政府管理城市的成绩。

这场斗争在形势上是苏联同国民政府的一次外事较量，实质上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为争夺旅大地区所进行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在旅大地委的直接领导和苏军当局的大力配合下，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并在斗争中锻炼、考验、教育了广大干警，提高了阶级觉悟和对敌斗争本领。

6月12日上午，国民政府旅大视察团乘长治号舰，由旅顺驶往葫芦岛，乘车经锦州返回沈阳。董彦平急急忙忙向行辕主任熊式辉报告视察旅大经过。

视察团返沈以后，原定6月16日去南京汇报。16日，前东北外交特派员、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蒋经国，赶到沈阳，与熊式辉商谈，准备去南京汇报的视察团也只好推迟行期。当时报界认为，蒋经国此次飞沈，是为“了解该团此次视察观感所得。”

6月18日下午，视察团的成员张剑非、徐祖善、叶南、邱南、陈思永、朱新民一行六人，携带该团视察报告前往南京。20日上午，张剑非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报告视察旅大经过，中午，蒋介石接见，面呈旅大视察报告一份。

6月27日，王世杰在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上作外交报告，通过了参政员尹述贤等在会上提出的建议案，请政府对接收旅大及东北战事性质，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声明。国民政府

宣传机构大造舆论，企图扩大影响，达到派出军队进入大连的目的。

6月28日，胡适就接收旅大一事发表谈话，要求“苏联领袖应了解中国国民党民主主义的立场。”为国民党接收旅大推波助澜。

国民党这一系列活动，表面上是打着恢复主权的旗号，急切接收旅大，实际上非常惧怕旅大地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为东北和华北两大战场的重要转运站和巩固的后方隐蔽基地。苏联政府基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存在，虽然同意国民政府派出行政人员进入旅大，建立行政机构，但坚持不准国民政府军队进入。1947年7月11日，苏联塔斯社就南京政府外交部公布《关于海军基地旅顺港与大连局势》，以及关联到这些地方建立中国行政机关等问题发表声明，驳斥国民政府的恶意诬蔑：“中国政府声明准备派遣部队驻扎于海军基地旅顺与大连两港，显系违背上述条约。”迫使国民政府陷入进退维谷、十分尴尬的境地。若派员建立行政机构，怕当俘虏；若派军队进入，又未得苏联准许。正如国民政府东北接收机关要员对中央社记者所称：“我旅大接收机关，如无充分政府军警之保护，势必准备为反抗政府者之俘虏，或做他人之傀儡。”

国民政府见接收旅大虽成泡影，但又不甘心失败。他们继续对旅大地区从陆地到海上实行更加严密的经济封锁，企图加剧旅大地区日趋严重的缺粮、缺煤等困难，造成人民生活更加艰难，引起群众骚乱不满，以扼杀旅大地方政府。然而，在旅大地委的正确领导下，人民群众没有被困难吓倒，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加紧生产，战胜粮

荒，支援前线，切实有效的把旅大地区建设成为一个巩固的后方基地。

1948年春，东北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日趋崩溃，所谓接收旅大的计划已成幻想。

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声中，旅大区党委及各级党组织于1945年4月，与广大人民群众公开见面，随之地方政府也进一步充实和加强了领导，正式公开成为东北人民政府管辖的一个解放区。

（大连公安史志办公室供稿）

旧社会黑暗的西岗

● 邹 毅

我于1929年出生在西岗永乐街，那时大连已经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多年了。

永乐街是一条出名的中国“窑子街”，地址在现在的西岗区消防队往东的下坡，这一条街大约有十几家妓院，再向东走靠近新开大街附近有几家贩卖吗啡的朝鲜人的店铺，在永乐街北面的福德街，也有妓院三、四家，还有一处大烟馆（供中国人吸鸦片的场所），里面有烧烟泡的妓女、有卖唱的贫家姑娘，还有卖糖果、香烟的小孩等等，是乌烟瘴气、五毒俱全的地方。

旧社会的工人、店员，每月收入很少，有些人白天劳累了一天，到了夜晚便想到这些地方寻欢取乐，他们是“今日有酒今日醉，不管明日吃和穿”。我认识一个四十多岁的帐房先生，妻子早亡。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有十八、九岁，是个店员，小儿子只有四、五岁，跟着父亲上班。他收入不多无力再娶，只好省吃俭用维持三口人的生活。他曾对我说

过：为了解除精神上的苦闷，每隔两三个月就要到妓院“逛”一次。有一次我路过北岗桥南侧一条小巷，我看到一个人拍了几下手掌，有个女人立即将门关上，我很奇怪，回头一看原来后面走来一名警察。以后我才明白这是“暗娼”，击掌的人是“放哨的”。

日本统治者表面上挂着“日满亲善共建东亚共荣圈”的招牌，暗地里却干着敲诈勒索、压迫中国人民的罪恶勾当。有些中国人到北方私运猪肉，往往是把猪肉用油纸包好捆在腰间，一旦被警察抓住，便以“经济犯”罚款或拘留处置；有些朝鲜族妇女到北方私运吗啡，为逃避官方检查，竟把死小孩的肚子剖开挖净内脏再将吗啡装进死小孩的腹腔内偷偷运回来。

我认识一个女孩子，她因家里贫穷被人从山东拐卖到大连，在我的邻居家当丫头。那时我们都不过十二、十三岁，常在一起玩耍，以后她突然不见了。过了半年左右，有一次我路过福德街，忽然听见一个女孩喊叫我，我回过头张望，后面没有人，我走了几步又听见侧面有人喊我，我扭头一看是一个花枝招展的小女人依在一家妓院门口朝我点头微笑，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我邻家那个失踪的小姑娘。我当时觉得当妓女很可耻便快步走开了。又过了很长时间，我再路过那家妓院几次都没看见她，我心想她可能又被转卖走了。

在万恶的旧社会，西岗是个悲惨的世界，吃、喝、嫖、赌到处都有，不知坑害了多少中国人。

（作者系大连市新华书店离休干部）

田风略传

●汪 惟

已故的艺术家田风同志，解放初期来大连工作，在共和国开国前后的六年间，为在殖民地的废墟上创建人民的文艺事业做出了令人永怀不忘的贡献，成为大连文艺史上居于显赫位置的重要人物。他与大连在五十年代中期所呈现的文艺大繁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为永远缅怀一位有功劳的艺术家考虑，为他作一部正式的传记也是值得的；这里作的略而又略之的“略传”只能力求比一般“小传”在内容上稍微充实些、具体些和准确些罢了。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旧中国持续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那一年，也是孙中山即将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前夕，在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东北故都——沈阳的一个军官家庭，生下了一个男孩——一个最新的民国国民。他叫田风。

他的父亲自幼习武，青年时代做过商家货物运输队的保镖。是受雇于镖局的镖师，还是商家专用的保镖？无据可查。但，两者都属于靠工薪生活的职员。后来，这位武士投